

巴蜀文献



第一辑

主编 舒大刚

执行主编 王小红

四川大学出版社

舒大刚

执行主编

王小红

巴蜀文献



第一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10@zh005）系列成果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川宣〔2012〕110号）系列成果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舒 星
责任校对:袁 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文献. 第1辑 / 舒大刚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14-8149-3

I. ①巴… II. ①舒… III. ①地方文献—汇编—四川省 IV. ①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5530 号

书名 巴蜀文献(第一辑)

主 编	舒大刚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149-3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2
字 数	31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巴蜀文化
巴蜀全書

先垂萬世
澤被學林

李學勤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於清華

主 编：舒大刚

执行主编：王小红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本根 王嘉陵 尹 波 杨世文

李文泽 郭 齐 彭邦本 舒大刚

顾 问：

项 楚 谭继和 胡昭曦 赵振铎

林 向 李远国 罗仲平

目 录

从《说文月刊》辨析“巴蜀文化”命题的初义	胡昭曦	1
《十三经恒解》校点笺解总叙	谭继和	12
研究巴蜀文献，建设巴蜀文明		
——《巴蜀全书》编纂的思考	舒大刚 万本根	31
《巴蜀全书》编纂名家谈		
李学勤先生巴蜀文化访谈录		43
项楚教授在《巴蜀全书》第一次专家委员会上的讲话 ..		53
业精于勤 持之以恒		
——纪念王利器先生	钟肇鹏	57
“光明讲坛·文化巴蜀”第一讲：		
“湖广填四川”与客家文化		
——从“解手”传说的来历与“土广东”的称谓说起		
.....	陈世松	66
儒学的实践与探索		
——以巴蜀地区为例	尹 波	81
谯定《牧牛图诗》的学术价值	郭 齐	89
宋儒李石著作考述	粟品孝 熊 英	93

张枋疑伪诗文辨析	杨世文	105
魏了翁的《周礼》观	夏 微	120
《周易集解》李鼎祚案语辑论（上）	田 君	143
略论宋代巴蜀杜诗单注本	彭 燕	212
来知德生平学行考述	王小红	230
杨慎《书品》李调元校订本校勘举证	王万洪	243
刘师培入川形迹交游略考之一	黄锦君	265
清代蜀中第一家遂宁张氏家族兴衰探原	胡传淮	281
从《默室日记》到《大梦琐录》 ——清末民初蜀中家族、人文史话磁场透视	曲 博	293
缪文远先生战国史研究五书叙录	李冬梅 邹 艳	304
三星堆器物坑年代问题的研究述评	于孟洲 吴超明	319
三峡陆路历史变迁及其特殊意义	金生杨	338
洞王沟农民石刻群	王洪林	361

从《说文月刊》辨析 “巴蜀文化”命题的初义

胡昭曦*

“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的学术文化命题，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正式提出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命名——“巴蜀文化”，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学界对这一命题的初始内涵和有关问题，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诠释。笔者近来在检索《说文月刊》等资料之后，认为该刊原著内容有助于辨析歧见、推进趋同。

一、“巴蜀文化”命题首现的确切时间

“巴蜀文化”命题的最早提出者是卫聚贤，这是学界公认的。对于这一命题确切提出的时间，论者或笼统说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或云是 1941 年和 1942 年分别刊载于《说文月刊》的卫聚贤所撰、同题为《巴蜀文化》的两篇文章，或云是 1942 年 8 月出版的《说文月刊》第 3 卷第 7 期《巴蜀文化专号》。

《说文月刊》于 1939 年 1 月在上海创刊，由卫聚贤主笔，说

* 作者简介：胡昭曦，男，1933 年生，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宋史、巴蜀区域史。

说文月刊社出版发行。因上海沦陷，该刊曾自第3卷第6期，即1941年12月以后停刊，1942年7月在重庆复刊，渝版卷期续前，自第3卷第7期起。1947年1月停刊，总计共刊发48期。



图一 《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封面

《说文月刊》先后有两期皆名为《巴蜀文化专号》，第3卷第4期（1941年10月15日上海出版）为该刊第一辑《巴蜀文化专号》（图一），第3卷第7期（1942年8月15日重庆出版）为该刊第二辑《巴蜀文化专号》（图二）。后者卷首有《复刊词》，写道：“本刊于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于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出至三卷六期时，因上海沦陷而停刊。于三十一年（1942年）七月从三卷七期起在渝复刊。”“本刊渝版第一号（即三卷七期）为巴蜀文化。”^①

^① 《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2年，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图二 《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封面和目录

在上述两辑《说文月刊》中，都载有卫聚贤题为《巴蜀文化》的文章，此二文标题一样，但内容不完全相同，后文是前文的补充和扩展。然而，首次提出“巴蜀文化”这一命题，是在第一辑《巴蜀文化专号》上。因此，“巴蜀文化”命题首现的确切时间，应该是1941年10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

二、“巴蜀文化”的最初含义

关于“巴蜀文化”的概念，笔者所见著述，主要有几种解释，一是先秦时期的巴蜀文化，即“原来意义上”或“狭义的巴蜀文化”，是一种与中原文化有别的青铜器文化，或认为最初说的“巴蜀文化”还“限于春秋战国”，亦即只指先秦时期；二是

巴蜀文化是“考古学文化”，它大致在西汉早期消失，这是从考古学分期而言；三是巴蜀地区的古今文化，近几十年来持此看法者渐多。那么，什么是《说文月刊》最初所说“巴蜀文化”的含义？这就需要从《说文月刊》所刊内容去探究。

笔者注意到，上述两辑《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表述的“巴蜀文化”明显有两种含义，下面略加论析。

第一，指的是先秦时期蜀国和巴国的文化。

卫聚贤在第一篇《巴蜀文化》中写道：

今年（1941年）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购得兵器一二，其花纹为手与心……六月，余第二次到成都，又购得数件，始注意到这种特异的形状及花纹，在罗希成处见到十三件，唐少波处见到三件，殷静僧处两件，连余自己搜集到的十余件，均为照、拓、描，就其花纹，而草成《蜀国文化》一文。八月，余第三次到成都，又搜集到四五件，在赵献集处见到兵器三件、残猎壶一。林名钧（均）先生并指出《华西学报》五期（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有“鐔于图”^①，其花纹类此，购而读之，知万县、什邡（四川）、慈利（湖北）、长杨（湖北）、峡来亦有此特异的花纹兵器等出土，包括古巴国在内，故又改此文为《巴蜀文化》。^②

卫聚贤还表示，计划在《说文月刊》续出《再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别论》和《巴蜀文化论》。^③

① 《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第82页转载有关此图的文字，题为《记鐔于》，作者赵世忠。

②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上海：说文月刊社，1941年，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③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上海：说文月刊社，1941年，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此后，卫聚贤在第二篇《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研究的动机”一节中，更为详细地写道：

去年（1941年）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购到兵器一二件，其上花纹为手与心。因为这种花纹在黄河流域出土的铜器上未看见过，遂引起我的注意，但因收集不多，难加研究。六月重游成都，得若干件……追求其出土地，知为西门外的白马寺，先后探访过十余次，始着手研究。八月余再到成都，又搜求到十余件……写了一篇《蜀国文化》，送林名均先生看，他说《华西学报》于民国二十六年曾发表一篇《记罽于》，并附插图及拓本，其上也有手形花纹。余亟购而读之，知为万县出土，其花纹与成都同，是此文化包括巴国在内，乃将题目改为《巴蜀文化》。将稿寄往上海，与前年在重庆试掘的江北汉墓材料并在一起，名为《巴蜀文化专号》，载《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四期。十二月余自西北考察归来，路过成都，又续得十余器，在重庆有收藏蒙（家？）让出七八件。……对于前文有补充的必要。《巴蜀文化专号》，内地见到很少，故于《说文月刊》复版先出此专号，而将汉墓的文章提开，将来另出一汉墓专号。^①

对于卫聚贤的两篇《巴蜀文化》，有学者曾作简要评介，写道，“1941年，卫氏在他的题为《巴蜀文化》一文中，用41幅图、17帧照片、48张拓片，记述了成都市面上收到的一批青铜、玉器”，卫氏认为似为“蜀国武器库”，又似为“蜀国宗庙”，且认为“春秋前蜀人有自己的文字”。“次年，卫氏又在同名的《巴蜀文化》一文中，又刊出150张图，并作了补充……成都白马寺

^①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重庆：说文月刊社，1942年，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后面的土阜可能是蜀国的社稷坛，蜀国都城就应在成都北门外高阜之地。……卫氏对这批兵器进行了辨伪，认为它们的时代应从商末至西周春秋战国。”^①又有学者说，“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术界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时候，还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与中原文化有别的青铜器文化来看待的。其背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都西门北面白马寺坛君庙时有青铜器出土，以兵器为多，形制花纹与中原青铜器有异，流布各地以至海外，被人误为‘夏器’。抗战爆发后，学者云集四川，遂对这些异形青铜器产生兴趣。卫聚贤搜集这批资料，写成考释论文，题为《巴蜀文化》。”^②

从这些内容看，卫聚贤所撰题为《巴蜀文化》的两篇文章，其初意是谈先秦时期一种有异于中原的蜀国、巴国的文化。因而，学者把该文所谓“巴蜀文化”释为先秦时期的巴蜀文化或“考古学文化”是有根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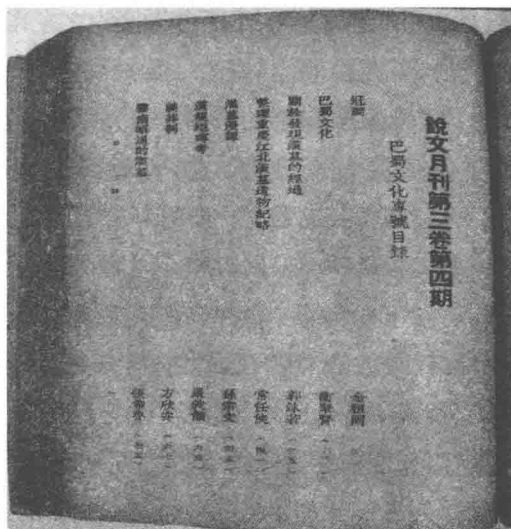
第二，指的是巴蜀地区的文化。细察这两期《说文月刊》，所谓“巴蜀文化”，其时限不只指先秦时期，而是自古至20世纪，其范围也包含全巴蜀地区的各种文化。这从两辑《巴蜀文化专号》的目录里，就可以明显看到。

第3卷第4期目录：《冠词》（金祖同）、《巴蜀文化》（卫聚贤）、《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郭沫若）、《整理重庆江北汉墓遗物纪略》（常任侠）、《汉墓漫谈》（孙宗文）、《汉规矩砖考》（严敦杰）、《谈葬制》（方欣安）、《云南昭通的汉墓》（张希鲁）、《重庆附近之汉代三种墓葬》（常任侠）、《乐山的蛮洞》（味橄）、《蜀胜志异录》（孔令谷）、《汉代的重庆》（卫聚贤）。附录、补白：《涪陵名称的由来》（鲁智深）、《中大历史学会试掘史迹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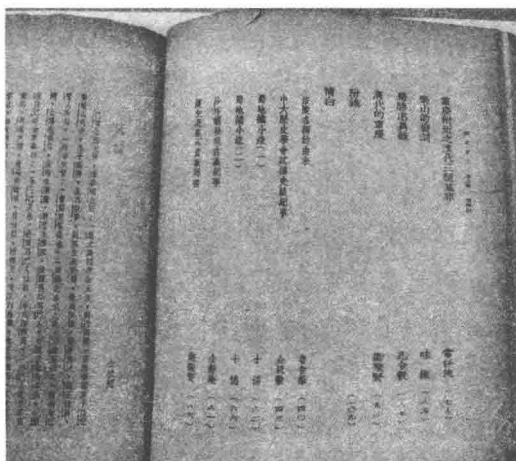
① 林向：《“巴蜀文化”辨证》，《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第35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② 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

(金毓黻)、《蜀地识小录一》(十穗)、《蜀地识小录二》(十穗)、《沙坪坝发现古墓纪事》(金静庵)、《汉左表墓石画说明书》(卫聚贤)。(图三、图四)



图三



图四

第3卷第7期目录：《巴蜀古文化之研究》（于右任）、《四川古迹之调查》（张继）、《避巴小记》（吴敬恒）、《巴蜀文化》（卫聚贤）、《甲饰》（王献唐）、《成都白马寺出土铜器辩》（商承祚）、《华西的史前石器》（郑德坤）、《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林名均）、《殷代的羌与蜀》（董作宾）、《蜀王本纪考》（朱希祖）、《漫谈巴蜀文化》（缪凤林）、《蜀锦》（徐中舒）、《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贡献》（傅振伦）、《钓鱼台访古》（郭沫若）。（图二）

从《说文月刊》两辑《巴蜀文化专号》的内容看，就地区而言，第3卷第4期主要是重庆地区，第3卷第7期则泛及于巴蜀地区；就时代而言，第3卷第4期许多是谈汉墓，第3卷第7期则包括很广泛，如汉代巴蜀文化（缪凤林文）、蜀汉的锦（徐中舒文）、宋益州交子（傅振伦文）、宋元至清的合川钓鱼城（郭沫若文）、民国时期川省造瓷厂（傅振伦文），等等。可见，编者所谓的“巴蜀文化”是自古至今且及于巴蜀各文化领域，因而才把这些文章列入《巴蜀文化专号》。

再看刊物编者对“巴蜀文化”认识的表述。当时参加《说文月刊》编辑工作的学者金祖同^①，在第一辑《巴蜀文化专号》的《冠词》一文中，列举了自古代到明清时期巴蜀地区的辉煌历史文化，写道，“巴蜀古称天府……于中华文化实多所贡献。巴蜀之于中国，虽地近边陲，而于学术文物有与中原吴越相长相成者，安可不加注意者乎？……中华崭新文化亦将于此处孕育胚胎，植其始基，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扬滋长……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②，是列述自古至明清的“巴蜀文化”

^① 金祖同，浙江嘉兴人，甲骨文研究学者，曾师事郭沫若、卫聚贤，参加《说文月刊》的编辑工作。参见“嘉兴市档案史志网·志鉴篇·嘉兴名人”。

^② 《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上海：说文月刊社，1941年，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和之后的“巴蜀新文化”，并把“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重要的地域文化。所谓“冠词”，指排于刊首的文章，即卷头语之意，是编者对本期刊物主要内容之概识。还可见到，在以“说文月刊社”名义发表的《复刊词》中说：“三卷四期为巴蜀文化——成都白马寺的兵器，与重庆江北的汉墓——但只寄到数册，内地见者甚少。此次复刊将白马寺兵器独出一期，汉墓将另出一专号。……本刊渝版第一号（即三卷七期）为巴蜀文化……五号为西北文化。”^①编者明显地把“成都白马寺的兵器”（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的主要内容）与“重庆江北的汉墓”均列于“巴蜀文化”之内。很值得注意的是，《说文月刊》的编者卫聚贤、金祖同等，从时间和空间上明白指出了两辑《巴蜀文化专号》中“巴蜀文化”的含义及其与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所谓“巴蜀文化”的异同，二者皆论“巴蜀文化”，前者指自古及今的巴蜀地区文化，而后者则只限先秦时期的蜀国与巴国的文化。

可见，《说文月刊》所说的“巴蜀文化”，包括卫聚贤文中所指的古蜀国、巴国的文化，即他的《巴蜀文化》一文的内容；也包括巴蜀地区自古以来的文化，即两辑《巴蜀文化专号》所涵盖的内容。这就是《巴蜀文化》命题完整的初始含义。因此，要把这两个方面并合在一起，才是《说文月刊》两辑《巴蜀文化专号》所说“巴蜀文化”的完整原意。

^① 《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据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9期为《水利专号》（1943年渝版第3号），主要介绍四川江水、李冰、大禹等情况，有于右任所作七首汶川纪行诗；第3卷第10期为《西北文化专号》（1943年渝版第4号），亦即《敦煌专号》[罗宏才《1940、1945 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活动评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年第4期]。

三、狭义与广义的“巴蜀文化”

对于“巴蜀文化”，目前学界有狭义与广义之释。狭义的巴蜀文化，是指先秦巴蜀文化或考古学所说的巴蜀文化；广义的巴蜀文化，是指从古至今巴蜀地区的文化。至于何时有此狭义、广义之分，流传着下面的说法：广义巴蜀文化是一个“新概念”，是有的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一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细察《说文月刊》，这种说法是不够确切的。

上面所述《说文月刊》编者对“巴蜀文化”内涵的诠释与表述，即已见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巴蜀文化”，即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的主要内容；广义的“巴蜀文化”，即两辑《巴蜀文化专号》所涵盖的内容。

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巴蜀文化专号》上，刊登有缪凤林的《漫谈巴蜀文化》一文。他在该文序言中写道：“历史上对于巴蜀文化的记载始于汉人，近世发现的巴蜀文物，我所见所知的亦以汉代者为多……我只能据汉代的记载和遗物，对于古代的巴蜀文化作一个合理的推测。”这已与卫聚贤两篇《巴蜀文化》限于先秦时期的巴蜀文化不同，而延伸到两汉时期，当指广义的“巴蜀文化”。缪文还明确提出了在讨论古代巴蜀文化时，要注意狭、广二义之说。他指出：“讨论古代巴蜀文化，有三个问题得首先提出：第一是巴蜀的范围，第二是这种文化为何民族所留，第三是开始在什么时候。巴蜀二字，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巴蜀，指的是‘巴人’‘蜀人’或‘巴国’‘蜀国’，大略相当于汉代的巴郡十一县、蜀郡十五县及广汉郡十三县……约得今四川全省之半。广义的巴蜀，则除巴人、蜀人或巴国、蜀国外，《史记》和《汉书》‘西南夷’所列举的西夷、南夷，亦皆概入。